

新观察

守住原创品格,捍卫文学尊严

□韩浩月

当一名创作者准备拿起笔或敲击键盘开始创作时,往往会被一种仪式感乃至神圣感所感染,进而获得前行的动力。如果说创作是一番耕种,是一场战争,是一次精神的升华或洗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原创力无疑是写作之行最核心的内在驱动。坚持原创,其实就如同农夫坚持艰辛而诚实的劳动,又如战士坚持专注不懈地向目的地进发。倘若创作失去原创,世上恐怕难以诞生如此众多名垂青史的经典作品。

对于原创的热爱,从创作者一踏上创作之旅,便极有可能贯穿一生。原创作品,是创作者亲手埋下一颗种子,并付出守护的心血,见证它一点点成长为树木——至于是否能成为参天大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完整参与、全然熟悉它的生长过程,可以毫不羞赧地为它命名,将其纳入自己的精神财富清单当中,把原创理念当作戒律顶礼膜拜的创作者,有着苦行僧般的朴素外在与光辉内在,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走出来的原创之路,鲜有前人走过,后人很难重复。

天空浩瀚无垠,从不同的窗口看出去,却能看到不同的景观,生出不一样的感受。所谓原创视角,就是从自己的窗口向外观察,那是一名创作者的专属领域。目光抵达之处,也许看到的同样是云朵、星辰、机翼、雁阵,但因为窗口后面的人不同,他们的表达自然就有了千差万别。原创视角的意义也是如此,即便面对的是同样的万古苍茫,有人可以看见斑斓,有人可以描述出深邃,有人能够讲出未知,有人则可以平地起高楼。所以,要相信自己视野里出现的事物,要仔细去搜索并捕捉源自视野与内心的灵感,让自己与世界万物建立唯有自己才能抵达的秘密通道。

坚守原创,源于原创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放大、丰富一个人的生命体验。生命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故事是一口掘不到底的井。一位真正的创作者,是无暇他顾的,他的一生都会徜徉在创作的花园当中,不断发现风景,创造奇观,并拥有叠加意境、滋养精神的超凡能力。原创性,是上苍握着创作者的手,递给他的礼物;当创作者走在原创的道路上,心中自会涌出充沛的喜悦。

原创性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自带一种神秘性,不可解释,无法清晰阐述。当一个人写下一个词语、组成一个句子、形成一个段落,那种属于原创性表达的神秘性就弥漫开来了。那些本来就很容易辨识的字词,通过原创之手组合之后,就形成了独特的标记。那些标记也是神秘的,它们神秘到创作者都无法知晓它们的产生源头与过程。提到苔藓你会想到一大片湿漉漉的暗绿色,但这

◆原创是文学最严肃的内核,既是文学的核心,亦是文学的魂魄。随时代演进不断嬗变的文学,在形式或内容上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但原创的内核始终不能变

◆坚守原创,源于它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放大、丰富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文学即原创,守住原创的品格,正是对文学尊严的捍卫

世界上有23000种苔藓,每一种苔藓从外在到内部,都有着不同之处,如果仔细观察,自然就会领略它们各自的风采。原创的乐趣就在于,让自己的作品生长成不一样的“苔藓”,且自己永远拥有独家的解释权利。

进入一座保存完好且可以正常使用的城堡,人会本能地想到阵地、战线、堡垒、进攻、防守等关键词,这是人的一种本能被唤醒的缘故。原创也是一种本能,一种写进创作者骨子里的冲动与执拗。它如同城堡坚实的城墙一样,是创作者不可被攻陷的安全感来源。一个主动拆毁或任由别人拆毁“城墙”的创作者,其作为创作主体,及其作品作为创作果实,都会终生带着破碎的裂纹,这裂纹不可视而不见,因为它的伤害性隐秘且绵长。为了避免这份伤害,创作者要把原创理念当作无需提醒的本能。这种本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创作中反复淬炼出的自觉——它无需外部规训,因真正的创作者早已将原创理念刻入骨髓。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学就是原创,守住原创的品格,正是对文学尊严的捍卫。

原创是文学最严肃的内核。文学由多种元素构成,才华、技巧、想象力、感受力、表达力等等,但如果失去原创的内核,作品便会如同失去了

“地心引力”一般,很容易飘散、垮塌、破碎。无论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乃至当下流行的新大众文艺,随时代演进不断嬗变的文学,在形式与内容上有不一样的面貌,但原创的内核不能变。原创既是文学的核心,亦是文学的魂魄,很难想象,失去原创性的文学,还能承载起读者的信任与寄托。

在网络与AI时代,越是资料与信息唾手可得的时候,创作者越要珍惜原创的权利。是的,原创是一种权利,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一般文案工作交给智能工具去处理的时候,文学原创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削弱,反而会被进一步强化。保持原创性,才会让文学不会变成一串串代码。同样道理,也唯有高度的原创性,才能真正提炼出人类的情感本质,凭借强烈的情绪共振与情感共鸣,来应对技术与智能所掌控的排列整齐的世界。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泥土的重生与时代的潮汐

——评叶梅《能不忆江南》

□程士庆

评论

白居易在晚年写下“能不忆江南”的诗句后,由烟雨、园林、离愁组成的“江南意象”便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种柔软乡愁。叶梅的新作《能不忆江南》中,江南不仅是诗意的栖居地,也充满现实的张力。这是一部近18万字的散文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游记或怀乡散文,而是一部关于“变迁”的厚重档案。作者将目光投向了浙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以“千万工程”二十周年为经,以安吉、嘉兴、绍兴、台州、舟山等地的地理空间为纬,绘制了一幅从泥土到云端、从山川到海洋的当代《清明上河图》。在这里,江南不再仅仅是用来“回忆”的旧梦,而是正在发生的、充满生机与阵痛、科技与人文交响的“未来预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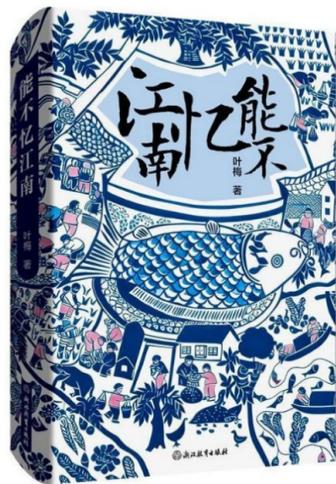
守护大树,就是守护大地的记忆

全书的叙事起点选在了安吉,这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也是解读当代江南变革的密钥。第一章《收获时节的安吉》呈现出一种峻峻与温情交织的质感。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的伤痕,直面那段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炸山开矿、尘土蔽日的日子。书中有个细节极具震撼力。在余村,废弃的矿渣被重新铺设成时尚的地面,采矿工具变成了艺术装置。这种物质形态的转化,隐喻着发展逻辑的根本变化。

叶梅笔下的安吉,不是一个静止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充满博弈的场域。她写潘春林这样的普通村民,写他们在“卖石头”还是“卖风景”之间的犹疑与决断。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余村夜话”。在千年银杏树下,返乡的年轻人与留守的长辈围坐,讨论的不再是收成,而是“如何让竹林长出科技”。这里的“绿”,不再是文人笔下的苍翠,而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与生活方式。

为了深化这一生态主题,作者在书中开辟了关于“天目山大树王国”的章节。余村的故事是关于“修复”,天目山的故事则是关于“敬畏”。叶梅详细描绘了那些历经数百年风霜的“霜木”与“翔凤林”,并引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记载,将时间的维度瞬间拉长。她写到,在这片靠近东海的山城里,树木不仅是植物,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记忆”。书中提到了古人“交树交印”的制度,官员离任时需核查古树数量。这种古代的“离任审计”与今天安吉护林员手中的数字化监测手段形成了奇妙的互文。

当现代护林员告诉作者“古树会咳嗽,病树会打鼾”,并开始使用地温传感器监测根系震动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科学技术完成了嫁接,让那片曾经受伤的山川得以重新呼吸,也让依附于土地的人们找到了新的尊严。作者通过对天目山大树的礼赞,将生态保护的意义提升到了文明赓续的高度。守护大树,即是守护大地的记忆。



《能不忆江南》,叶梅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11月

“数字田园”的审美重塑

在叶梅笔下,嘉兴湘家荡的稻田呈现出一种科幻般的现实主义色彩。作者不厌其烦地记录那些精准的数据,例如北斗导航控制下的拖拉机误差不过2厘米,物联网监测站实时上传土壤墒情,无人机在低空喷洒生物农药。这些工业与科技的词汇切入柔软的泥土并未显得突兀,反而构建了一种新的美学——“数字田园”。

更值得注意的是,叶梅敏锐地捕捉到了乡村在“富起来”之后的“美学觉醒”。描写三星村时,她花费了大量笔墨去刻画那个由老砖窑改造而成的文保纪念馆。昔日冒着黑烟的烟囱,如今长出了桃花;原本堆满砖瓦的场地,变成了一条铺满花瓣的引人驻足的小道。作者惊叹于那个“形似艺术馆”的家宴中心,高大的门厅、落地玻璃窗、墙上挂着的农民画作,让人恍若置身于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园。

这种细节的捕捉至关重要。它揭示了“千万工程”的深层肌理,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产值的增加,更是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重建。当农民开始在墙上作画,当公共建筑开始追求设计感,这意味着乡村不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化空间。书中提到的“新农人”小郭,那个在温室大棚里像操作精密仪器一样控制遮阳帘的退伍军人,正是这种新乡土的代言人。他们留下来,是因为这里既有中关村般的科技挑战,又有桃花源般的艺术生活。

江南之所以为江南,在于其深厚的文脉。然而,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安放传统的灵魂,是本书探讨的另一个深层命题。第三章《梦里犹呼起看山》提供了一种充满张力的观察视角。

乌镇既有木心笔下的“从前慢”,又有世界互联网大会的“5G快”,摇橹船的桨声与数据中心的嗡鸣声在此共赴。江南的文化是一种活着的精神。叶梅写绍兴塔山小学的唐泽民夫妇带着女儿远赴四川马边支教的故事,看似是在写扶贫,实则是在写江南士大夫精神的现代回响,写一种“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到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再到今天援川教师的默默奉献,这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善意,正通过具体的个人,向更广阔的中国腹地辐射。

《明月共潮生》是全书气象最为宏大的一部分,它标志着江南叙事从小桥流水向波澜壮阔的突围。叶梅没有回避现代治理中的琐碎与艰难。在描写舟山群岛时,她将笔触深入到了“厕所革命”和海洋垃圾治理的细枝末节。书中提到了岱山县涂口村曾经的“70多个旱厕、露天粪坑”,以及整治过程中村干部如何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用干净环保的移动公厕取而代之。这些看似不“文学”的细节,恰恰构成了本书最扎实的现实根基。作者详细描述了“蓝色循环”治理模式,记录了渔民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回收海洋塑料垃圾。这种对“藏污纳垢”之处的直视与改变,比单纯的歌颂海景更有力量。它证明了江南的现代化是落实到每一个排污管网、每一个垃圾桶的精细化治理。

当然,江海不仅有治理的理性,更有情感的波涛。书中关于台胞重返大陈岛的描写,堪称全书情感浓度最高的段落。那位年过五旬的女子踏上岛屿时嘶哑的喊声“回家喽”令人印象深刻。叶梅在这里处理得非常克制而深情,“她或许是在向先辈禀报,也许是在向后人呼唤”。这一刻的大陈岛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成了连接海峡两岸的血脉纽带。

义乌商城的早晨,中欧班列的汽笛展示了江南开放的另一面。这里的江南敢于向海洋要发展,敢于在全球贸易的版图占据核心位置。书的结尾,作者描写了钱塘江的大潮。那“一线潮”由远及近,最终化为雷霆万钧的轰鸣。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既是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精神的写照,也是时代洪流的隐喻。

叶梅以一种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悲悯,深入到了这场变革的肌理之中。她不仅记录了美丽乡村的风景、增长的数据等结果,更记录了那些阵痛、犹豫、奋斗与欢笑的过程。江南正在以一种生态更优美、经济更发达、文化更自信、社会更和谐的全新姿态,屹立在东海之滨。这不仅是浙江的故事,更是关于土地如何觉醒、乡村如何振兴、文明如何赓续的中国故事。在那片被无数次吟咏过的土地上,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正在被这代人亲手创造出来。

(作者系浙江文学院院长、浙江文学馆馆长)

《延河》《清明》《作品》《红岩》《芙蓉》

新大众文艺如何再现大众经验

□陈海红 郭超

面临数字化浪潮对文学生态的重塑,文学如何回应时代的叩问?新年伊始的众多刊物给出的答案是:以先行者的姿态,践行并深化新大众文艺这一重大命题。以2024年《延河》的首倡为开端,这一概念迅速引发学界共振,最终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众多刊物纷纷投身这一时代浪潮,结合理论与创作两方面的努力,建构起新大众文艺的话语体系与精神空间。从众多刊物发表的新作之中,能够观察到一种较为典型的叙事特征:一方面延续现实主义传统,书写基层生活与日常经验;另一方面通过作品题材与叙事策略的调适,将大众生活经验作为叙事的关键资源,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学期刊对大众化问题的不懈探索。

2026年第1、2期,《延河》以专栏形式集中刊发“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文章,从“人民性、网媒性、公共性”三大要素出发,为解释与评述这一现象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工具。白桦谈道,新大众文艺的核心是“作为文学主体的觉醒与崛起”,呈现了人民大众参与文艺活动突出的“自觉性、主动性、自主性”。这一论断直指文艺人民性与大众性的议题,将新大众文艺从单纯的媒介现象提升到文化权利的回归。从这一角度观察,《延河》刊发了大量聚焦现实生活的作品,其叙事对象以乡村社会与家庭生活为主,题材选择上注重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如数广胜的《生父来了》描写少女丁蓝与生父、养父的纠葛,写尽贫困家庭在生存压力之下的尊严与抉择;杨光举的《隐身衣》则以冷峻的笔触,刻画乡村少年杨小霜因为身份缺失的挣扎与幻灭。这些作品超越了深奥的苦难叙事,体现了普通人生活的复杂性及深刻性。

《芙蓉》2026年第1期中,刘庆邦的《月夜独行》描写青年郑海丰被派往县城拉柴油的经历,接续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劳动经验与普通人物的高度关注;夏天敏的《建房》通过农村社会的现实逻辑、普通家庭的选择困境,揭示基层社会的欲望结构及其嬗变。向本贵的《当阳坡》则聚焦村庄搬迁的争论以及村民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产、发展经济的过程,体现了乡村中传统文化与现代网络、市场机制的交织与碰撞。这类作品往往承担着现实观察的功能,也持续关注着大众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

类似地,《红岩》2026年第1期中出现于显眼位置的是“叙事”栏目。这一栏目集中刊登了四则短篇小说,整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现实经验导向。

值得关注的是,其表现对象也从农村扩展开来,如《164路站牌》以公交站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通过不同人物停留与相遇的片段,拼接出城市生活的多样面貌,扩展了书写大众生活的范畴,强化了文学叙事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与此前文学期刊中常见的宏大叙事或历史题材不同,《红岩》与《芙蓉》的作品更侧重书写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叙事题材与人物身份均具有社会普遍性,也更容易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共鸣。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卢一萍发表于《清明》2026年第1期的《你为什么要去阿里》以边防军人艾岗巴跨越数千公里从“世界屋脊”调到北边的赴任之旅为主线,串联起一个家族四代人献身边疆的壮阔史诗。小说不只是对军旅题材的文学书写,更将主题的人民性、时代性与笔触的个体性、经验性有机结合起来。艾岗巴来自一个戍边家族。从牺牲的祖父艾喜河、大伯艾噶尔到父亲艾札达,这个家庭的命运最终与边关紧紧缠绕。艾岗巴选择追随前辈的脚步,是因为“我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然后就像中了魔一样”,这是中国军人家国情怀最朴素的表达。他的故事不是孤立的英雄传奇,而是无数军人家庭的缩影。整部小说的主体是艾岗巴随老万的军车从叶城出发、穿越新藏公路前往阿里的赴任之旅。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堪称世界上路况最差、海拔最高的公路。卢一萍以近似纪实的笔法,详细记录每一程的艰险:库地达坂的陡峭、麻扎达达坂的险恶、黑卡达坂的漫长、界山达坂的令人窒息……每一个达坂都是一道生死关,每一次翻越都是一次对肉体与意志的极限考验。这种对个体经验的细致书写,使读者能够切身体验边防军人的艰辛与伟大。如结尾指导员刘世哲所言,艾岗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的选择出自情感的召唤、理想的牵引——他想替父亲抵达那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这种个体情感的驱动,恰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特点:其书写不回避私人性,而是从私人性出发,抵达更为高远的时代精神。

当代文学期刊保持专业化的同时,也尝试与大众文化的变化同调。譬如《延河》中,素人作家如王计兵、曹兵也开始与专业作家并列。当前,文学期刊不再猎奇式地强化“素人写作”的“标签”与“苦难”,而是引导读者关注作品本身。吴燕青的《在香港的离岛种菜》发表于《作品》2026年第1期,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她在香港大屿山租地种菜的

真实经历。吴燕青的身份多元,她是妻子、是母亲,也是一位从医生转行的教师,是现代化都市中的普通职业女性。她的写作动机并非来自专业作家的职业自觉,而是源于种菜这一生活实践所带来的心灵触动。生活于香港这一“走路都要奔跑的城市”,她的时间被传统、通勤、育儿切割得支离破碎,种菜是她与碎裂时间抗争之中安顿身心的生活方式。从寻找土地、购买种子、学习耕作,到与蚊虫搏斗、与鸟雀争食、与台风暴雨抗争,吴燕青以接近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种菜过程中的动人细节。她的记录没有刻意的修饰,却通过泥土的芬芳与汗水的咸涩,自然生长出动人的力量。

整体来说,上述刊物既体现出文学期刊长期延续的编辑传统,也体现出新大众文艺语境下文学边界的扩展。一方面,大多数刊物仍然延续了传统文学期刊的基本模式,即以小说为核心体裁,以专业作品维持文学权威,以理论文章提供思想支撑。另一方面,刊物对叙事题材的选择也明显增加了现实经验的比例,使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逐渐上升为文学期刊主要的内容来源之一。如果说传统文学体制往往强调作家的专业身份与文学技巧,新大众文艺则更强调大众主体与生活经验。目前的文学期刊中,上述两种逻辑并未完全彼此取代,而是处于一种复杂的并存关系之中。上述刊物的总体结构正体现出这种状态:现实经验叙事扩大了文学表达的社会基础,而实验性写作与理论探讨则维持了文学场域的内部结构。从题材上,我们不难发现新大众文艺的广阔天地——从乡村青年的困境抉择,到都市女性的心灵安顿,再到边防军人的牺牲奉献;既书写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也书写极端环境的生命坚守。这种多样性,正是新大众文艺生命力的体现。

(陈海红系广东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郭超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